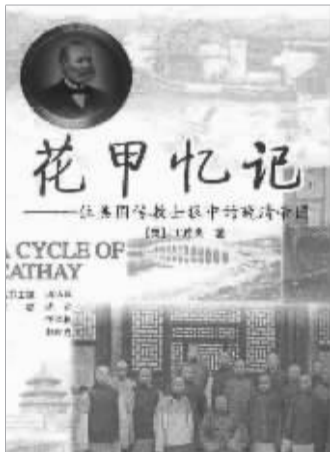




丁魁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汉文名丁魁良, 字冠西, 美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 在中国生活了62年) 1850年来到宁波, 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10年。1860年离开宁波后, 丁魁良担任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 时间长达25年 (1869—1894) 之久。在同文馆里, 他创办近代中国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 又于1888年建立星台 (观象台) 和物理实验室。1863年他翻译《万国公法》, 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介绍国际法。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时, 丁魁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总教习, 授二品。1916年丁魁良在北京去世, 享年89岁。

丁魁良在中国共生活了62年, 而他认为在宁波的10年是其一生中“最有成就”的时光。丁晚年写成的《花甲记忆》对这10年进行详细的描述, 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记录了他的宁波印象。



人文 总第5629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丁魁良与宁波

向勇

一、宁波是“使波浪宁静下来的城市”

经过134天的海上航行, 1850年4月10日清晨, 丁魁良乘坐兰涛号轮船由美国波士顿抵达香港, 这一天他刚好23岁。因为当时香港并没有船直航宁波, 所以他只能经沿海各口岸转道北上。1850年6月26日, 他到达宁波。

当时, 宁波已经开埠八年。那时候外国领事、商人、教士、侨眷等一般都居住在江北桃花渡一带。教会给丁魁良安排的房子也在城外, 但是他坚持要住到宁波城内, 以方便了解当地居民。初来乍到, 一切都是新鲜和有趣的。丁魁良认为宁波民风淳朴, 对人比较友好、亲善。据《花甲记忆》记载, 有一次他去奉化, 当地的农民非常好客, 感情邀请他在家中吃饭, 但主人只给了他一双筷子, 这让习惯刀叉的丁魁良无法将虾、鲱鱼、鸡肉等美味佳肴送进嘴巴, 吃相也异常狼狈不堪。于是主人就将纺车上的梭芯给了他, 权当作刀叉, 让丁魁良享受到了美味佳肴。还有次在摆渡时候, 丁魁良的仆人掉进湍急的河流之中, 仆人不识水性, 所幸被一渔民救起。当仆人带着贵重礼物来感谢这位渔民的时候, 却被这位渔民婉言谢绝, 这让丁非常感动。

丁魁良对宁波的风景也赞叹有加。他游览过奉化雪窦寺, 认为那里的瀑布堪与美国的约塞米蒂瀑布相媲美。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宁波的城墙、运河。据丁魁良回忆: 晚清时期的宁波城墙为石墙, 有20至30英尺高, 周长为6英里, 用巨大的花岗岩石筑成; 城墙因为时间久远而呈现灰色, 而且墙上爬满植物, 显示着历史的悠久; 城墙的顶部开阔, 可以驾驶一辆马车。闲暇时, 丁还曾雇了一匹马, 在城墙上来回驰骋。另外他还对“宁波”这个地名进行了研究, 他认为宁波这个名称的含义并不是字面所示的“宁静的波浪”, 而是表示“使波浪宁静下来的城市”, 即“海定而波宁”之意。

二、最早用拼音拼写宁波话

初到宁波, 丁魁良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听不懂宁波话, 于是他就请两位教师轮流上课。在《花甲记忆》里他饶有风趣说起了他学习宁波话的种种趣事。因为教师不懂外语, 他又不通中文, 两个人之间很难交流, 所以他的宁波话老师就想用实物来教学的方法。丁魁良学会的第一句宁波话就是柴火棍子, 但这需要教师拿来一根柴火棍子来示意; 而教黄狗这个宁波土语的时候, 中文老师就到门外牵一只小狗, 然后学狗叫, 汪汪汪叫几声, 然后再用宁波土话说“黄狗、黄狗”。教火车这个词时, 教师更是煞费苦心,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字典可以来查询, 宁波也没火车, 所以这个老师就在房间里一边喘气, 一边呜呜叫, 叫一会儿, 然后喘一会儿气, 模仿火车的样子。据丁魁良描述, 几天之后, 宁波话的学习已从“令人厌烦的任务变为令人神往的娱乐消遣”。他的宁波话进步神速, 到宁波三个月就能够听懂老师的话了。

丁魁良认为宁波话既动听又容易学, 但宁波话只有口语, 没有文字, 而且实物教学法对于教师来说实在是大费周折。有感于此, 丁魁良决定用拉丁字母注音的办法来学习宁波话, 并把每一个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丁魁良创立的这套音标, 即他自谓的“洋字拼音”让他能较准确地重复宁波话老师的发音, 学习宁波话

更加方便、快捷, 六个月后就“掌握了可以随心想用的大量词汇”。正如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龚缨晏所言: “丁魁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最早想出来把宁波方言用拉丁字母来标示, 也就是我们现在汉语拼音这个样子, 这个是他最早想出来的。”

时间久了, 丁魁良的交际面逐渐扩大, 他又师从宁波人曹子渔学习官话。官话又称北方方言, 即后来的普通话。官话的学习为他日后北上充当美国公使翻译和进入清政府上层官场提供了机缘。

三、刻苦钻研中国文化

学会宁波话、官话后, 为了全面了解中国, 丁魁良又开始刻苦学习中国文化。五年里, 丁魁良完成了四书五经的学习, 后来他在《花甲记忆》里写下自己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受: “中国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 它记载的无数史实构成一笔空前绝后的精神财富, 这笔财富是印度无法相比的; 中国的哲学家勇于思辨; 中国诗人的诗歌可以同古希腊、古罗马的诗人相媲美; 并且中国有伟大的现代小说体裁的小说家, 这要比西方早1000年。”

丁魁良对中国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吏的办法非常认可。“无论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有何种的缺陷, 人们必须承认, 中国在鼓励人们发奋努力和奖赏学业成就上设计了最佳的方法。”在《花甲记忆》里, 他记载了宁波人章盛成为新科状元的情景: “鞭炮声震耳欲聋, 乐器演奏声喧嚣, 乐师们手里拿着节日的旗帜, 戴着有红色流苏的帽子, 他们是来向院落的居民宣布, 后者的亲戚章盛 (咸丰二年壬子恩科状元) 已经在北京的皇宫里举行的殿试取得第一名的荣誉, 成为新科状元。这个穷书生的家庭一夜成名, 整个城市因为他的好运而欢欣鼓舞。状元夫人应邀去宁波城的六个城门处, 把大米撒在地上, 以驱逐厄运。因为人们相信, 一个人的辉煌成功会使众人免受厄运的威胁。”

四、宁波的风土人情

在《花甲记忆》里, 丁魁良对19世纪中晚期宁波的风土人情进行详细的记载, 成为了解老宁波的特别读本。

19世纪中后期的宁波, 赶庙会时是宁波市民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之一, 庙会分为祭祀、迎神、赛会三部分, 其中的龙舞造型精巧、表演独到。《花甲记忆》里这样写道: “巨龙用彩绸扎成, 由把头戴进鳞片闪亮的龙肚子中的数百个男子举着走街串巷。龙的后面跟着一大群仙女, 与之一起表演的还有抬菩萨游行, 场景壮观。”宁波人还比较喜欢去庙会看戏, 那时候流行于江浙一带的曲种, 名为滩簧调, 演唱风格柔婉, 音韵中和, 接近口语, 民间气息浓郁, 深受百姓喜爱。“戏曲具有奇异的魅力, 演员是花腔女高音, 没有凳子, 观众站立很久也不感觉累。”另外赌鹌鹑、斗蟋蟀等活动也能吸引许多观众。

甚至阅兵场里也人声鼎沸, 清兵的演练也成为百姓消遣的内容。据《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志》记载, 宁波那时候清兵驻军共有五营, 前营800多人驻扎在鄞县大嵩所, 后营800多人驻扎在应家棚。清兵演练的项目主要是射箭和近身搏斗, 《花甲记忆》里这样记载: “射箭术是在马上完成的, 清兵在地面上

挖了一百多步的壕沟, 骑马者需驱马进入壕沟, 然后用马刺使马疾跑起来, 在经过离他约有三四十步远的靶子时候, 把手里的箭射出去。近身搏斗开始前, 士兵分成两排, 相互对峙, 一边是身穿黄底黑条纹制服的老虎队, 士兵的帽子上装饰有老虎耳朵和鬃毛; 另一边士兵的帽子上长着角, 身上有闪闪的鳞片, 代表着龙。战鼓一响, 双方士兵展开徒手搏斗, 不使用任何武器, 完全依靠个人体力来取代武器。只要抓到对方, 把他作为俘虏拖走或背走, 就算获胜。”

五、科学可以“使整座迷信的高楼倾倒”

19世纪中后期的宁波, 由于科学的不发达, 迷信色彩比较浓厚, 这些在《花甲记忆》和《赫德日记》里都有所记载。

“邻居院子里摆着桌子, 上面放着蜡烛, 人们在念经来抚慰那些鬼怪, 以便能使他们开恩, 放走冤魂。因为邻居在火灾抢救自家财物时, 被一根着火掉下来的木头砸伤并受到惊吓。因为他昏迷不醒, 人们就认为他的魂灵被鬼怪带走了。”

“在干旱的季节里, 我看见有一长串的农民手持绿色的柳枝, 护送一顶用柳条编成的轿子, 鱼贯走进衙门。‘我们在求雨。’他答道, ‘我们抓住了龙王。那龙王就在轿子里, 你可以自己去看!’果然, 轿子里摆着一个陶盘, 有样东西在里面游水。其实它不过是只蜥蜴。”

在与一些中国学者交往后, 他又发现“中国就像牛顿之前的欧洲一样, 即使学问很高的中国学者也不明白石头为什么会掉到地上, 也不知道为什么用泵可以抽水”, 中国人“通过‘阴阳交感’给予所有现象一种合理的解释”。为“使整座迷信的高楼倾倒”, 丁魁良认为科学可以改变这些谬误。1851年, 他在崇信义塾 (后迁往杭州, 改名为育英义塾, 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 讲授天文、地理等课。崇信义塾是宁波最早的寄宿制新式男子学堂, 即是今天浙江大学的前身, 也是今天宁波四中办学源头之一。后来丁还在宁波南门内、外各创办一所走读学校, 开设了西方自然科学课程和应用科学课程。另外他还参与了在宁波出版的浙江省第一份新闻报刊《中外新报》(中文版)。

在宁波10年, 丁魁良非常喜欢和当地老百姓交往, 并为此主动要求迁到宁波城内与当地居民一起居住。在宁波期间, 他交往的对象有曹子渔、范馨棣及唐傅中等, 多为下层知识分子或普通百姓。另外还交往了一些官僚士大夫, 其中对他最有影响的就是张斯桂。

张斯桂, 号鲁生, 宁波人, 曾入曾国藩幕, 曾任驻日副使, 后来张斯桂还自告奋勇地为丁魁良的《万国公法》撰写序言。1854年, 镇海、慈溪、鄞县等地的商人集资, 从广州向外商购得轮船一艘, 定名为“宝顺”号。“宝顺”号是“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 开创了在中国使用轮船之先河”。张斯桂就是出资人之一。船购回后, 集资者决定聘请张斯桂督船, 因此, 张斯桂就成了中国第一位轮船船长。1860年, 张斯桂免费用自己的汽船送丁魁良由宁波到上海。

丁魁良离开宁波后, 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花甲记忆》里一句“尽管你缺点很多, 但我爱你始终不渝”可以看出这位美国人对宁波的真挚感情。

网坛风雨路

69

——李娜自传

我现在是把我的所在地址发给经纪公司, 由经纪公司去帮我做这件事情, 如果我改地址, 必须提前通知经纪公司。以前在国家队的时候, 是由国家队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代理这些事情。

有时参加公开赛或者大比赛, 耐克中国就派石玲来陪着我, 这算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体育圈与文艺圈不同, 经纪人的影响力要小一些, 而且主要以服务运动员为主, 运动员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比赛上。

一般比赛结束后, 照例会有新闻发布会, WTA的一名官员会来陪着运动员参加新闻发布会。之后, 我就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 因为该说的话已经在会上说完了。经常跑网球的记者都知道我的性格, 也不会贸然采访。有时会有人发短信到我手机上, 我一般会经纪人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 让他们与经纪人联系, 然后由经纪人安排。这样可能让媒体的朋友工作不大方便, 但我也被情势所迫, 作为一个运动员, 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或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 我只想专心地训练、比赛。

第二次手术后, 我没有打2009年的澳网, 2月份直接去

打迪拜、多哈的比赛, 成绩很差。赛后姜山找不到我, 我一个人找了个角落大哭了一场。托马斯说了很多安慰鼓励的话, 他告诉我这是刚做完第二次手术就出来打比赛, 要我相信我自己。

打完迪拜、多哈后, 我又回德国训练了一段时间, 然后去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打球。这一年我一直在摸索, 在伤病的状态中重新回到这个圈子。

2009年5月下旬, 我在法网打进了罗兰·加洛斯十六强。这是我手术后的第一个起步。

这一年的6月5日, 我和姜山一起拿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的毕业证书。姜山一门课不落地修完了所有课程, 而我的后两年课程都是自学的, 期末才回学校去考试或是交论文, 结果两年的课程拖了四年才修完。老实讲, 老师对我也算网开一面, 我才顺利地拿到了毕业证。

姜山本该比我提早两年毕业的, 但这个心眼儿毕业前才发现自己还差一个选修课的学分, 为了陪我比赛, 他陪我东奔西走了很久才回到校园补上了这个学分。这算是我们枯燥的网球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

拿到毕业证后好事连连, 6月14日, 我在伯明翰草地赛的半决赛上击败了老对手莎拉波娃闯入决赛, 这是中国选手的首个草地决赛。同年9月, 我打进了美国八强。世界排名又往前冲了5位。

我对自己的进步感到欣慰, 但这一年的四处奔波也让我旧伤复发了。打美网的时候, 我非常辛苦, 从德国飞

中国, 又从中国飞美国, 美网打完, 我的膝盖一天也撑不住了。这时我就去找国家队的人商量: 能不能不打全运会?

2009年, 我就因为伤病错过了当年的澳网, 如果我赶在全运会期间做手术, 康复顺利的话, 正好可以去打2010年的澳网, 我感到自己的兴奋度越来越高, 正在渐入佳境, 这次澳网发挥得好的话, 我将有机会迈进世界前十!

但队里的领导显然不认为这是个好消息。不像澳网, 全运会在我们国家的体育机制内很受重视, 因为它直接牵扯到各方面的很多利益。当时湖北省体育局的某领导找我谈话, 他说了一句让我震惊不已的话: “李娜, 相信我! 我是过来人, 世界前十没有全运会冠军重要。”

听完这话, 我顿感无力, 我跟姜山说: “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谈, 根本谈不下去。”中网比赛是在9月份, 打完中网就是全运会。那时我已经准备做第三次膝盖手术了, 我的想法比较简单, 我想: 做完手术我再回国, 实在不行就残着一条腿上去, 你们非让我打全运会, 我就只能这么打。

姜山不同意, 他说: 我们不能这么做, 虽然他们这么说话不合理, 但我们做事情不能让人家指指点点。

姜山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他总是对的。

结果我又不得不放了医生一次鸽子。原本跟医生说好了第二天做手术, 姜山打电话来, 告诉我不要冲动, 要回国跟队里全部说清楚以后再处理事情。我只好向医生道歉, 说得先回国确定下情况。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